

王富仁

序跋集 [上]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富仁序跋集. 上 / 王富仁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4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81036-823-0

I. 王... II. 王... III. 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240 号

王富仁序跋集 (上)

作 者: 王富仁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责任校对: 廖醒梦

封面设计: 郭 炜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16

印 张: 53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全三册)

ISBN 7-81036-823-0/I·160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4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 / 020-22232999 传真 / 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3833 传真 / 603-9056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王富仁

序跋集 [上]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汕头大学
学术丛书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 第二辑 ➤

王富仁序跋集（上）

王富仁 著

王富仁序跋集（中）

王富仁 著

王富仁序跋集（下）

王富仁 著

法律移植与文化冲突

——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的文化悖论

熊金才 著

潮州学论集

陈景熙 著

萨本仁史学文集

萨本仁 著

程家明自选集

程家明 著

政策创新与地方社会的科学发展

郭剑鸣等著

编余拾论（上）

——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及其他

翁奕波 著

编余拾论（下）

——编辑学潮学摭论及其他

翁奕波 著

撞击与交融

——中外文化交流史论

陈占山 著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庄园 编

文化的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

庄园 编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总序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他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面前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10~20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我的序跋文

（代自序）

我害怕写“书评”，所以序跋文就多了起来。

我从山东，到了陕西。又从陕西，到了北京。并且是文革之后最早的硕士研究生和最早的博士研究生。学问没有做大，人却认识得很多。并且都是从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学术“荒歉的年头”挣扎过来的，发表篇文章、写本书都很不容易。写了书，就希望有点影响，就希望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知道它，能够读它。在这种情况下，“书评”就变得重要了起来。出了书，有一篇或几篇书评，给自己宣传宣传，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才会有更多的读者来购买，来阅读。这样的书评，自然要多说好话，多说优点；缺点说得多了，不但起不到宣传的效果，反而将人家的书给封杀了。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很早就对写书评产生了一点戒备心理。熟人太多，又大都像我一样，是从艰苦中挣扎出来的。给这个写了不给那个写，就在熟人中分出了亲疏，反而容易产生误会，产生裂隙了，但要一视同仁、来者不拒，谁让我写我就给谁写，那我自己的事情就什么也做不成了。熟人太多，书评太多，一年三百六十天，至少也得将一半的时间花在写书评上，那就成了“书评专业户”了。我是不甘心当“书评专业户”的，所以，一到北京，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不请别人给自己的书写书评，也不给别人的书写书评。果不然，没过多久，我西北大学的一位老师，让我给他的一部新出的专著写书评。这位老师，是我一向很尊重的，并且他对我也很关心、很器重，可以说是一位恩师。当时我颇费踌躇，但最后还是拒绝了他。直到现在，想起来仍然有点愧疚之感，觉得对不起他，有点不近人情。但从那之后，我也就真的实践了我不写书评的诺言。（来到汕头之后，写了



两篇书评，但已是20年之后的事情，并且是“特例”。)

拒绝了写书评，却没有拒绝给人写序跋文。我当时只是一个博士研究生，一个“青年学者”，原本就没有几个人愿意让我写序写跋，所以我也不必担心多了怎么办。开始的几篇序，有的是写给自己家乡爱好文学的青年的，有的是写给自己授课的班级的学生的，有的是写给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学的，有的是写给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学界的同事的。再说，写序与写书评不一样。写书评是不能不写出对一本书的感受和认识的，是不能不做出自己的或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的，而写序则可以不负责任，只要和这本书沾上点边，就可以乱扯一通。就这样，除了给自己的书要写个自序或后记之外，也开始给别人的书写序。谁知人也是会老的，年岁越来越大，在学界混的时间越来越长。比自己年轻的人也越来越多。年轻的愿意让年老的人给自己的书写篇序言，也是人之常情。已经开了头，后来也就没有理由拒绝了。这样，我的序跋文就多了起来。虽然想起来令人汗颜，俨然像一个“名人”，这个写篇序，给那个写篇序，颇有附庸风雅、以“导师”自居的嫌疑。但像已经发动起来的一辆破摩托车，刹不住把了，一开就是二十多年，于是就弄出了这样一大堆序跋文。

我认为，只要了解了我的序跋文写作的“缘起”，也就能够知道，我的序跋文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序跋文。真正的序跋文，应该是一个学术领域的权威们写的。由于权威们比该书的作者更有水平，更有学问，所以不论是肯定意见还是批评意见，都有点高屋建瓴的气势，三言两语，就把该书的精神提起来了。放在书的前面，就像给这本书戴上了一顶桂冠，立马就使这本书庄重了许多，高贵了许多。因为是“高屋建瓴”，所以这样的序跋文不会太长，不会太啰嗦。一长，一啰嗦，就不庄重了，话也就不值钱了。将领的命令向来是很简洁的，只有打了败仗跑回营地的士兵才会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唯恐别人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如此狼狈地败下阵来。我的序跋



文则像寄生在人家的书上的寄生虫。平时自己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研究过，人家有了系统的研究，自己看了，也有了一点零零星星的想法，就借人家出书的机会，也把自己的这点想法附带着发表出去。所以我的序跋文有的很长，因为没有人家的书做基础，自己的这些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说，得赶紧说，一次说完。不然，离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趁着人家出书的机会，自己也算有了一篇文章。这样的序跋文，对人家的书是没有好处的，对我自己却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自己平时没有更广博的知识和更精深的研究，借着别人的研究，多掌握一些知识，多思考一些问题，虽然并非做学问的正路，但到底比仅仅缩在自己的那点知识的蜗牛壳中，永不探出头来看看更广阔的世界，要好得多。

所以，我得谢谢那些让我写序的作者们，他们的书让我开阔了眼界，想了一些自己平时想不到的问题。

当然，也得谢谢汕头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我这样一些零里八碎的序跋文做编辑，又还得符合出版要求而做字词的订正，太麻烦他们了。

2005年12月1日

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 目 录 ❖

我的序跋文（代自序）	4
我走过的路——《王富仁自选集》自序	9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后记	19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后记	20
自我的回顾与检查——《先驱者的形象》自序	22
一颗渺小心灵的微弱蠕动——《文化与文艺》代自序	43
本书各篇文章的内容提要及补充说明 ——《历史的沉思》代序	64
我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解读 ——《灵魂的挣扎》代自序	89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后记	97
《现代作家新论》写在前面的话	101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自序	103
《中国的文艺复兴》前言	108
《古老的回声》自序	111
《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自序	116
《门外语文教学谈片》自序	119
《蝉之声》序	121
《蝉声与牛声》自序	122



《说说我自己》自序·····	124
《呓语集》小序·····	133
《鲁迅纵横观》译后记·····	134
韩文译本《鲁迅论集》序·····	135
闻一多诗论——《闻一多名作欣赏》代序·····	139
《文选》情结与文学的循环系统 ——《中国现代美文鉴赏》序·····	165
《感伤小说》序·····	174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脉略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代序·····	186
“诤诤之士”傅斯年——《诤诤之士傅斯年》序·····	194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代序言·····	201
《文化与社会丛书》总序·····	245
《中学生课外阅读与欣赏·中国现代散文卷》编者前言·····	248
《中学生课外阅读与欣赏·中国现代小说卷》编者前言·····	250
《端木蕻良小说》前言·····	252
《中国诗歌经典》序言·····	273
最是鲁迅应该读——《鲁迅小说选读》代序·····	357





我走过的路*

——《王富仁自选集》自序

我是在1978年考取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之后正式开始学术研究的。此前在山东省聊城四中当语文教师的时候，也曾写过几篇有关鲁迅作品分析的文章，参加过薛绥之教授主编的《鲁迅杂文中的人物》的编写工作，但用现在的眼光看来。那还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正像一个小偷要到一个大户人家去偷东西，先得站在院墙外面往里投几块小石头，那时的一些文章起的也就是这种“投石问路”的作用。从来没有收集过，这个集子里也不包括那时写的文章，但在这个期间。给了我热情关怀和鼓励的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薛绥之教授，我是永志难忘的。没有他的帮助，我是连试探着写文章的勇气也没有的。当了研究生之后，“学术研究”成了自己的工作，不做也得做。不会做也得学着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从那时起一直撞到现在。假若用句文人好用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的“学术生涯”，实际上用老百姓所说的到学术界来“混碗饭吃”概括更为恰当。我那时实际是没有什么“思想”要宣布，没有什么“主张”要坚持的，只是想做篇论文，混得一张学位证书。好达到调换个工作的目的。但我们那代研究生是很幸运的，国家正在提倡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的限制相应地放松了很多，外国文学也不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学一律加以排斥了。时代是一种初春的气候，越冬的大树还没有发芽，有远大发展前程的新株还没有长成。我们这些在严寒中被冻僵但侥幸没冻死的种子露出一一点绿意，就成了

* 《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人们容易看到的東西。我在大學學的是俄文，對俄國文學多多少少有些了解，魯迅又是我當時的研究對象，於是就選了“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這個題目。心裡沒有多大的顧忌，寫的也就比此前的同類文章隨便些，很難說有什麼獨立見解，但這點“隨便”的態度與當時的改革開放精神無意之間便有了關係。大概也是由於這麼一個原因，我的《魯迅前期小說與果戈里》、《魯迅前期小說與契訶夫》、《魯迅前期小說與安特萊夫》等幾篇文章發表之後，頗得了幾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前輩學者的鼓勵，而給我最大幫助的除了我的導師單演義先生之外，則是《文學評論》編輯部的王信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樊駿先生、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的王德厚先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楊占升先生。是他們，連拉帶拽地把我拖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我的碩士學位論文的全文，後來得以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本書所收的《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就是它的第一章的綜論部分。它曾作為向北京魯迅誕生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的學術論文而收入《魯迅誕生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現在看來，它已經沒有多少新鮮感，但作為我在學術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對我的意義是重大的，故而我仍然把它收到這個集子里。

我對“學術研究”開始認真起來，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我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的思想意義》一文之後。它對我的意義，是使我開始有了一點“自我意識”。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上帝忘了播種、施肥和灌溉的一代人。講學問，我們不如我們的爺爺輩、叔叔輩，我們沒有他們那么多、那么深厚的學問根基；論思想，我們不如我們的弟弟輩和兒子輩，他們沒有我們這輩人的思想負累，一開始接受的就是新時期的思想教育。我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舞台上還能不能扮演一個角色、起到一點作用呢？在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無意之間使我發現，我們這一代人還是能夠做一點事情的，那就是從對中



国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表现上对中国文学作品做一点新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正是中国文化翻了锅的时候。正像一池子清水，被人用棍子搅了几搅，把积淀了几千年的残枝败叶、污泥浊水都搅和了起来。里面的鱼也无法生存了，纷纷浮上了水面，大的、小的、黑的、白的、肥的、瘦的、善的、恶的，统统漂了上来，这个池子里都有些什么鱼，人们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不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正像不慎掉到了井里，反拣到了一个早已遗落在井底的金镬子一样。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来，我们的爷爷辈和叔叔辈重视的是这种主义和那种主义，我们重视的则是在各种主义背后的人，我们的弟弟辈和侄儿辈则成了新的主义的输入者和提倡者。后者的文化视野更宽广了，但讲的又是这种学说和那种学说。在这时，中国人大都找到了适于自己的文化面纱，不必赤裸裸上阵厮杀了。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反而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来得直接和亲切，至少暂时是如此。所以，从人的角度讲文化，讲文学，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趋向。这点“自我意识”对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尊敬我的学术前辈，但也不愿受前辈人的束缚；我羡慕我的学术后辈，但也不因之而自暴自弃。这与我的这点“自我意识”是有莫大关系的。1982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后，就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它的全文后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题出版，本书中所收的《〈呐喊〉〈彷徨〉综论》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摘要，曾单独在《文学评论》上分两期连载。现在就把它作为我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收在本书里。

在《〈呐喊〉〈彷徨〉综论》中，真正属于我的观点的实际上只有一点，那就是区分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放在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中来理解，来分析。在现在看



来，这已成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在当时，它却引起了一点小的风波，有的教授和学者甚至加给了我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的罪名。对别的人，这也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我，却是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的大事。它的直接后果是把我卷入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斗争的漩涡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在学术文化界的境遇和环境条件。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把自己当作超脱于现实思想斗争的“自由人”或“第三种人”，再也无法把自己意识为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正的教授和学者。它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我是属于一个思想文化阵线的。这个阵线是什么？由谁做首领？我并不知道，但我的思想文化倾向并不是所有人的思想文化倾向则是毫无疑义的。有了不同的思想阵线的感觉，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不同文化阵线之间如何进行学术对话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我是颇下过一番钻研功夫的。我不轻视马克思主义，更不敢轻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不论什么主义，也得有益于中国人对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思考和理解，也得有益于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主义，是不能成为标准和法则的，标准和法则永远存在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人和人的要求里。既然“不断变化着的人和人的要求”是人类学术活动的基础，那么，我就不能把自己定格为一个教授和学者，甚至也不能把自己定格为一个知识分子。这只是我的一种偶然的职业选择，而不是我的基本的身份和立场。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中国人，并且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用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话来说，我作为一个人就得说“人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得说“中国人的话”，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就得说“现代中国人的话”。假若说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思想的话，那么，这就是我那时明确起来的最最根本的学术思想。我想，“现代中国人的话”应是什么样子的呢？现代的中国人至少得希望现代的中国人生活得逐渐好起来，希望现代中国的社会逐渐地完善起来。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思想的自由化，是现代中国社会逐渐完善的根本标志，也



是现代中国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和美满的基本条件。这三条，是现代中国人相互对话的基础。脱离开这个基础，我们就说不到一家去了，学术论争也就不是学术论争而成了用学术吵架。

我是从鲁迅研究开始我的学术研究的。鲁迅同时有两个侧面：一个是作为思想家的侧面，一个是作为文学家的侧面。而我，是更为重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侧面的。这使我与我的学术同行们走了一个不完全相同的学术道路。与此同时，我在大学学的是俄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实在是一窍不通，直至现在，除了鲁迅的作品，我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是很少的，读的中国现代的理论著作就更少。说句实话，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我是有愧于我所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也是有愧于我的学生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写的有血有肉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很少，而写的干巴巴的抽象论文颇多。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喜欢我的这种倾向，但对于我自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本书第一部分收的就是其中的四篇文章。《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企图解决的是如何观察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脉络问题。两个平衡的问题是我首先提出的，但也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近现代的中国，在世界的范围中一直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它迫使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起而克服它，改造中国文化，但这种改造总是从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开始的。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不平衡，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企图在现有的基础上恢复中国文化内部的平衡，但这种努力却维持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及化外部关系中的不平衡状态，我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都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中进行的，从而也产生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传统文化心态、中西融合的文化心态。紧接这篇写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这篇实际上分析的是在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下造成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



发展的特征。因为我认为，推动着中国近现代文化和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慕外崇新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首先从羡慕外国、崇拜外国开始，但自己是在中国文化的教养之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往往首先接受的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教条，直到这种理论和教条在中国变得并不新鲜并不“先进”，它才真正结出了文化的果实。而在这时，慕外崇新的知识分子可能早已抛弃了这种理论和教条，去提倡更新、更先进的东西去了。不能不说，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非常乐观，我这两篇文章是不那么乐观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下争取来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带来的必将是传统文化心态的重新泛滥。因为我们在有了一阵子发展之后又不那么自卑了，我们中国人又有了骄傲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必要老是吹捧人家而贬低自己呢？现在的一切不如意、不安定，不都是由于有了改革开放才出现的吗？这个责任应由谁来负呢？当然应由那些有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的知识分子来负了。用传统的对抗外国的，用古代的修正现代的，就成了一个无法遏止的文化潮流。这里不是一个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哪种文化心态的知识分子能够找到表现自己的机会的问题。但传统文化就能拯救中国吗？也不能！它未能拯救古代的中国，怎能拯救现代的中国呢？真正能够拯救现代中国的只是现代中国人在各个方向上的实际努力，学术文化只是这诸种努力中的一种，它起的是为不同的追求开辟思想道路或寻找社会空间的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思想的追求遇到了一个槛，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迈过去了，而这时涌起来的是经济的大潮，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点乐观情绪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提倡悲观主义的，也悲观得那么欢欣鼓舞。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使那些主张乐观的，也乐观得酸溜溜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鄙视工人农民的，认为他们很愚昧，只知道吃饭穿衣，没有高雅的精神追求；



而到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自己也成了穷措大，才感到仅仅有文化是没有用处的，钱才是最最实在、最最可爱的东西。我也是爱钱的一个，并且从来都爱钱；但我并不认为钱从此就成了一切，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就只能“为学术而学术”了。在这时，我写了《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试图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说明当时面临的文化危机。感谢我的山东的文学同人，特别是《文学世界》编辑部的王光东先生，他们在那种求趣味、讲时效的文化氛围中仍然发表了我这篇毫无趣味的干巴巴的抽象论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文化发展也有一个周期性危机的问题，也有复苏、发展、繁荣、萧条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走红”的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外国人说过没有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我并不知道，但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人这样说过，所以我很宝贵我的这篇文章。到了最近几年，用我的话来说，文化又有了复苏的迹象，但在这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已不是原来的开放派，而是传统文化派。这时又是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对21世纪文化的展望就不能不带上了传统文化派的文化印迹。这时一个异常诱人的文化口号是“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属于传统文化派，所以我也不同意这个文化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颇具有文化沙文主义的性质。文化是全人类的，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原则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应当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不能说只是哪个民族的文化。20世纪不是美国文化的世纪，21世纪也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里只有一个各个民族的人民如何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谁是世界的老大的问题。《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就是针对这个口号而写的，由于文化环境的关系，我不能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全部表述出来，但我认为，我提出的几个问题还不能算是老生常谈，所以我把它收在本书里。

如上所述，我的现代文学知识是极为缺乏的，但自己到底跻身